

# 鴉片戰爭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鴉片戰爭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鸦 片 战 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875 字数 58,000

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186 定价: 0.15元

##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 目 录

- 一、垂涎欲滴的英国侵略者 .....1
- 二、可耻的鸦片贸易 .....6
- 三、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15
- 四、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25
- 五、三元里人民狠揍侵略军.....36
- 六、侵略战争的扩大.....45
- 七、闽、浙和沿江人民的抗英斗争 .....56
- 八、《南京条约》.....61
- 九、美、法侵略者趁火打劫 .....68
- 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76

## 一、馋涎欲滴的英国侵略者

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sup>①</sup>

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它是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向中国举行多次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前的半个世纪，统治中国人民的清朝政府已经十分腐朽。政治衰败，军备废弛，财政困难的现象逐渐明显。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少数剥削者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手中。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到一天比一天重的税捐、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阶级矛盾随之激化。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日趋活跃。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持续九年、遍及数省的白莲教起义，就是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大爆发。这次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却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清朝的统治。此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起伏此起彼伏，不断出现。清朝的反动统治已经开始动摇。

正当清朝封建统治日益动摇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已在迅速发展。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十九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一八二五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来推销其工业品，以摆脱危机，增加利润，便成了英国资产阶级极其迫切的要求。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了它的印度殖民地后，更加注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力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伸展其侵略势力，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

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倾销。当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他们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自己制造的，他们不急需也根本没有钱来购买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他们有时还得要出卖一部分副业产品来缴纳繁重的地租和捐

税。因此，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运来的呢绒和洋布，简直没有什么销路。

英国资产阶级从一七八六年起到一八二九年的四十三年间，曾经先后八次来中国推销棉纺织产品。但是这种棉纺织产品，销路不佳，多次亏本。例如，一七九〇年，英国运来曼彻斯特棉布一百匹，成本六一二镑（当时汇价每一英镑合白银三两），卖得白银二千两，差不多刚够本。一八二一年，英制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种亏本的情况，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有所改变。这就是说，直到这一年，英国的棉布在中国市场上，才第一次获得了利润，但是它的销售量却是很有限的。

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在中国缺乏销路，就使中国在与英国的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特许设立的一个组织，它经营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的垄断贸易，进行殖民事业）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平均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销当时英商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在一七八一——一七九三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八十七万元，只抵得上中国输入英国茶叶价钱的六分之一。这样，欧、美资产阶级为了获得中国的丝茶，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十九世纪初年，从广州流入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以至当时来广东贸



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直到十九世纪初年，一直保持着出超地位的情况，对于进入了大机器工业生产，积极要求扩大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十分焦急的。他们把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大量的销售，看成是由于清朝政府采取了闭关政策的结果。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一口；并有清朝政府特许的行商垄断进出口业务。因此，英国侵略者就千方百计地想影响清朝政府改变这样一个政策，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商人自由贸易，来达到它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七九三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夏尔尼为专使，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朝政府谈判。他向清朝政府提出了除已开放广州以外，还要开放天津、舟山、宁波为通商口岸，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减低关税，允许在中国传教等要求。十分明显，这些都是侵略性的要求，它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而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拒绝。

但是，不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是不会死心的。一八一六年，英国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来中国，重新提出了马夏尔尼曾提出的那些侵略要求，再一次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拒绝。

到了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欲望愈加迫切。他们对中国市场，也愈加向往。什么“如果中国的市场打开了，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售量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销售量还

要大”，等等。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大叫大嚷，充分地暴露了它们对中国馋涎欲滴的丑恶嘴脸。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特性时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sup>①</sup>由此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决不是偶然的。

---

<sup>①</sup>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四五页。

## 二、可耻的鸦片贸易

英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英国侵略者用尽各种办法，想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他们发现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的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因为它很投合那些穷奢极欲而又精神空虚的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的需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就用鸦片来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朝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同时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特权，以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实现。一八〇〇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权后，千方百计地来扩大鸦片的生产和输出。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并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了鸦片加工工厂，根据中国吸食者的口味，大量制造这种毒药。鸦片制成后，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属

印度政府的官吏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都有很大利润。首先是东印度公司。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的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卢比，而它的拍卖价格，包括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超过原来成本的九倍。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东印度公司每年要拿出大量的银元来中国换取茶叶和丝，但自从它取得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与制造权后，光凭在印度种植鸦片，就可以从中国换回大量的丝、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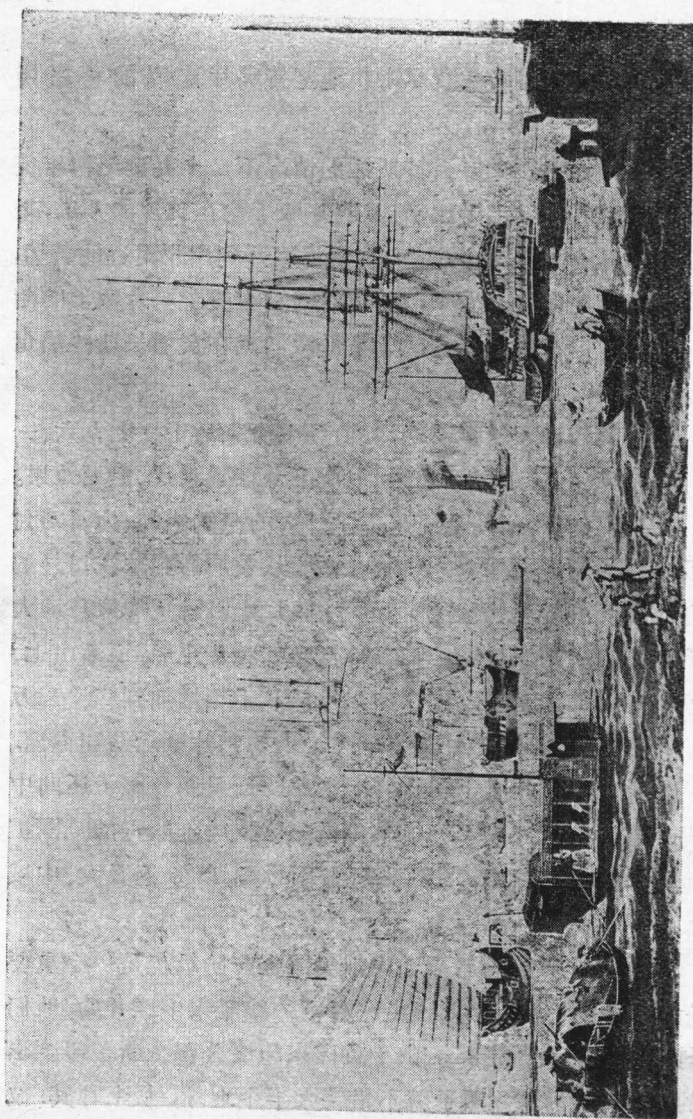
其次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鸦片战争前，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比一切合法的生意都好做，一则鸦片是偷运进口的，不需要纳税；再则中国烟贩购买鸦片是预先一次把钱付清的。贩卖鸦片，不仅利润大，而且稳重可靠。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一八一八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的利润极高，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一千元。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都发了横财，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捞到了“爵士”的头衔。如查顿本人，就拥有大量财产，一八四一年，这个大鸦片贩子

又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下议院的议员。再如，另一个鸦片贩子马地臣，他是在一八四一年从中国溜回英国的。这个家伙究竟从鸦片走私赚了多少钱回国，还没人知道，所可知的，是在他回英国后的第二年，就把苏格兰西海岸的整个路易斯岛买下来了。仅仅为了开垦这个岛，他就投下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镑！就是这样一个鸦片贩子，后来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

鸦片贸易不仅是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的大利所在，而且也与英国政府和一切对东方贸易有关的英国资产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英国政府来说，茶叶税是英国政府大宗的税源。从中国输入英国的茶叶，一七九三年是一千六百万镑，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增加到三千万镑以上；英国政府的茶叶税收，一七九三年是六十万镑，到一八三三年就增加到三百三十万镑。英国从中国运出这样多的茶叶，主要是靠鸦片走私换取的。至于对一切与东方贸易有关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当时在东方的主要市场是印度。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五年的二十一年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从不到一百万码增加到五千一百万码。英国机器棉纺织品大量输入印度，使印度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极大的摧残。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印度总督在报告中招供：“棉织工人的白骨，漂白了印度平原。”而英国棉纺织品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日益大量销售，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依赖于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印度农民是靠种植鸦片的收入，来购买英国纺织品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肮脏罪恶的鸦片贸易，是与英国政府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这



一八三五年时广州附近的黄埔商港

就是为什么英国侵略者费尽心机地坚持鸦片走私的秘密所在。

在英国侵略者千方百计贩运的情况下，十九世纪初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卸在澳门，秘密销售；然后将船开到广州附近的黄埔，公开出售其他商品。后来清朝政府的官吏受了鸦片贩子的贿赂，对鸦片走私放任不管，于是毒贩们竟在黄埔长期停泊趸船，堆囤鸦片，公开出售。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长，清朝政府先后于一七九六、一八〇〇、一八一三、一八一五年，多次下令查禁鸦片，但无效果。

一八二一年，清朝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禁烟措施。为了对付清朝政府的禁烟，烟贩们将鸦片趸船从黄埔撤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附近的洋面。从这时开始，鸦片走私就更加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起来。长期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趸船，逐渐由七、八只增加到二十多只，囤存的鸦片从几千箱增加到二、三万箱。一八二一年后，伶仃岛就成为最大的鸦片贩运站和毒窟。

鸦片走私不仅有趸船作为贩运站，而且鸦片贩子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鸦片走私网。英国侵略者竭力把贩毒的范围扩大到沿海各省和内地，以致私运鸦片的“窑口”，遍及大、中城镇。

在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中，美国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一七八三年美国侵略者第一艘船来中国开始，他们就向中国进行武装走私。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出产的鸦片，美国鸦片贩子就不惜绕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

斯搜罗鸦片，运来中国。据当时的调查，在广州的美商，几乎全部经营鸦片。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三十年代的旗昌洋行，都是美国侵略者在中国巨大的贩毒组织。美国侵略者为了大规模地进行武装走私，特别建造了许多专门用来偷运鸦片的“飞剪船”。这种船不仅航行速度超过其它同类的船只，并且装备着大炮和各种武器，当他们遇到中国水师船巡查时，就悍然发炮攻击，直冲而过。

美国侵略者用走私鸦片，掠去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一八二四年，一个美国鸦片贩子招供：他在过去三年中，不曾有一块银元运到中国来，但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银元以上的商品，其中绝大部分是丝和布匹。美国侵略者通过贩毒发了横财。鸦片走私与贩卖奴隶一样，成为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鸦片走私之所以愈来愈猖狂，与英、美侵略者用贿赂手段，收买清朝政府的官吏是分不开的。一个英国侵略分子描写清朝水师的情形说：“这些家伙们经常受贿，每箱鸦片收五元到十元，他们请船长给他们保留，不经过中国走私商的手。……他们每月到船上来一次，按箱索贿，前来取款。”

由于英、美侵略者采取了走私与行贿并用的卑鄙手段，鸦片就象一股汹涌的黑色毒流，滔滔不断地向中国倾泻而来。一八二一年，鸦片输入中国不过五千多箱，到一八三一年，就达到一万多箱。

一八三四年在可耻的鸦片贸易史上是重要的一年。由于日益增强的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反对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



的垄断，这一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从此，英国就对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开放了对华贸易。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英国政府任命英国贵族、上议院议员、海军高级将领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在这以前，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代表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的外交代表常驻中国。英国侵略者企图借这样一个机会，和清朝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达到增开通商口岸，推销鸦片，扩大中英贸易，获得海军据点的侵略目的。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到达澳门，由于他的侵略要求未获结果，恼羞成怒，竟于九月五日命令两只英国兵船炮击虎门炮台，并狂妄地进行恫吓，宣称中英战争即将发生，中国应完全负责。

律劳卑不久就死了。英国政府任命原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罗宾臣，与原英属几内亚高级官员、侵略殖民地的老手查理·义律，先后为驻华商务监督。这两个家伙上台后，更加千方百计地支持鸦片贩子进行武装走私，破坏中国的禁烟。罗宾臣为了便于帮助英国鸦片贩子的走私，竟把他的办公地点，从澳门迁到伶仃洋面的单桅快船上。在英国商务监督的支持下，到一八三七年，英、美鸦片贩子竟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运进了中国！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到了后来，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里的太监，各级衙门中的差役、轿夫，军营中的兵丁，寺院里的僧尼、道士，城市里的妓女等，

也都吸起鸦片烟来。据一八三五年的估计，吸鸦片的人达二百万以上。鸦片的侵蚀，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

在经济方面，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据英国公布的记录，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四年间，中国共有二千五百二十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一八四〇年），从中国流出去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的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白银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三十年间，银价上涨一倍以上。

银价上涨，直接受害的是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因为在市场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价格，是按制钱计算的。清朝政府的赋税，却是一律规定按银两征收。劳动人民缴纳赋税，要先将制钱换成银子。银价高涨，使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日益加重。同时，白银的大量外流，也引起了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危机。由于白银日少，收税困难，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库存一

天比一天减少。官吏、士兵的吸食鸦片又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走私贿赂更增加了吏治的败坏。这样，鸦片问题就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焦虑不安、急切关心的问题。

### 三、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

广大群众对于烟毒泛滥所造成的灾难，早已非常不满，他们坚决要求禁烟。在清朝政府的内部，随着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社会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逐渐形成在鸦片问题上主张“弛禁”和严禁的两种不同意见。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将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靠严刑不能禁止鸦片，与其长期让白银外流，不如对鸦片征税，解决财政困难。

一八三六年六月，掌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卿许乃济，向清朝统治阶级的总头子道光帝上了一个奏本，提出了一套“弛禁”鸦片的办法。在贸易上，他主张取消一切禁令，恢复鸦片进口照药材纳税的老办法，放手让外国商人把鸦片纳税进口，不过只准以货换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这样，便可以防止白银的外流。在吸食上，他认为可以禁止官吏、兵丁吸食，不必禁人民吸食。因为在他看来，吸食鸦片虽然会缩短人的寿命，但中国人口日多，不怕户口会减少。在种植上，他主张听任人民自便，谁愿种就种。国内种植的人多了，外商无利可图，外洋来的鸦片不禁自绝。

显然，这种主张是在为非法的鸦片贸易争合法的地位，是鼓励鸦片的盛行，引诱劳动人民种烟吸毒，使鸦片的祸害更加扩大加深。这种谬论一经出笼，就得到了英国毒贩们的大头目义律的拍手称赞。他一再向他的上司报告这个“可喜”的消息，急切地等待“弛禁”命令的公布。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弛禁”论的。在清朝政府的官吏中，也有些人纷纷上书道光帝，驳斥许乃济，主张严禁鸦片。一八三八年，掌管殿廷仪礼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指明过去禁烟无效，是由于与鸦片有利害关系的各级衙门大小官员的破坏。他从清朝政府财政危机的情况出发，尖锐地指出：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银价将愈贵，国家库存的银子会愈来愈少，赋税和开支将无来源，国家无经费开支，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提出了一个“重治吸食”的建议，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的，普通人处以重刑，官吏加重治罪。他还认为人人戒烟，鸦片则不禁自绝。

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后，环绕着禁烟问题，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道光帝把黄爵滋的意见，交给各省总督、巡抚商议。反对黄爵滋主张的，有直隶总督琦善等二十人；赞成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八人。二十八人中反对的占多数，这说明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中，禁烟的力量是薄弱的。

清朝统治阶级上层中关于禁烟问题的这场争论，是在鸦片大量输入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统治的情况下发生的。“弛禁”与“严禁”，都是从如何稳定其封建统治出发的。但是，在鸦片

大量输入，危害到中华民族生存的情况下，主张严禁鸦片，无疑是完全应该的。

从环绕着鸦片问题的争论中，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对其统治的威胁，倾向于严禁。特别是林则徐的“鸦片危害极大，必须严禁；如果再马马虎虎下去，只怕几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出可以抵抗敌人的兵丁，也将没有银子可充军饷”的说法，使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下令将许乃济革职，叫林则徐进京讨论禁烟措施。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禁烟问题发生争论时，他正在湖广总督任内，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积极禁烟。一八三八年十二月，林则徐到北京。道光帝连续召见多次，最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但是要禁烟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仅有英国侵略者从中破坏，而且在国内已形成一支吸毒、贩毒和受贿的极端腐朽势力。这股极端腐朽的反动势力，是以满洲贵族、道光帝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他们不仅反对严禁，连弛禁也反对。因为他们不单依赖于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鸦片的走私从中接受贿赂。他们实际上是外国鸦片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在严禁派占优势时，暗中破坏禁烟。等到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后，他们就跳出来公开打击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向英国侵略者投降。

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广东人民反对英、美侵略者私贩毒品的斗争，已经十分高涨。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戒毒、禁毒的强大压力下，原来主张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改变了

看法，主张严厉查禁。在邓廷桢的禁烟措施下，被迫缴出烟枪、表示决心戒烟的人，数以万计。大批依靠鸦片走私生活的地痞、流氓，纷纷畏惧潜逃。许多英、美鸦片贩子也深感禁烟运动再扩大下去，对他们将更加不利。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当清朝政府的官吏，押着中国烟贩到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前面的广场上执行绞刑的时候，英、美鸦片贩子，竟胆敢砸碎绞架，赶走清朝的官吏，捣乱刑场。英、美侵略者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立即掀起了包围“洋馆”的群众性的大示威。

一个在场的美国鸦片贩子描写当时的情况说：“到下午，来围洋馆的群众愈聚愈多，美国商馆屋角的守卫者被迫撤退，事情看来非常严重。”包围洋馆的群众，“至少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之多，似乎决心要消灭‘番鬼’（当时广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称呼）们，到五点钟时，纳埃先生和我一同从屋顶上翻出去找伍浩官（行商伍敦元），由他写信给广州知府。六点半时，中国官军鸣锣挥鞭而来的声音安慰了我们。官军把暴民（外国强盗对中国人民的诬称）赶出广场，甚至把许多人赶到河里淹死。于是洋馆的门大开，洋人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描述的喜慰。清朝官军们点起灯笼在广场上通宵坐守。第二天早晨，洋人们向官吏道谢，官吏向我们保证道：‘一点也不必害怕！’那个罪犯也移到别处去行刑了。”

从这个美国侵略分子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在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声势，迫使外国侵略者从屋顶上逃出去“求救”，现出一副狼狈相！

“行商”——中国买办阶级的老祖宗，为外国侵略者卖命的可耻嘴脸；清朝封建统治者在自身受到凌辱后，不但不加反击，反而转过来镇压人民，保护侵略者！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和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反侵略的路线，而封建统治阶级则是走的镇压人民保护侵略者的屈辱投降路线！

在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贩毒斗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广州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当时在广州的外国毒贩中，最大的两个鸦片贩子是英国的查顿和颠地。查顿知道风声紧急，就逃回英国鼓动战争。颠地因为当时手中存有大量鸦片，仍留广州进行顽抗。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形势下，禁烟的信心更为加强。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于三月十八日通知外国鸦片贩子，要他们在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存鸦片数量，造具清册，听候处理；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林则徐在通知中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中国严厉禁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心破坏林则徐的禁烟措施。三月十八日，林则徐发出缴烟的通知后，义律一面令珠江口外的鸦片趸船逃走，并作战斗准备；一面抗议广州设防，并准备强迫英商撤离广州。三月二十四日晚，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在夜里携带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但这时中国人民已经提高了



警惕，义律的阴谋没有得逞。

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禁烟，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守洋馆，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断绝趸船与洋馆的交通。义律看到蛮横的抗拒已经不能得逞，便变换手法，命令英国鸦片贩子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义律为联合美国侵略者一致对华，也劝美国烟贩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这样做的险恶用心，是想把林则徐处理不法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间的问题，为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

从一八三九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陆续缴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又二千多麻袋，合计二百几十万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在销毁鸦片的过程中，准许民众和外国人到场参观。当林则徐宣布销毁鸦片时，在广州的一些外国侵略分子(其中包括一些传教士)，诬蔑“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但是，当他们到现场进行了参观后，在事实面前，也只得承认，在销毁鸦片的每个过程中，工作人员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他们的“臆想”。

虎门海滩销毁鸦片，是中国禁烟的一个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禁毒的决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手段，也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英国侵略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缴烟事件发生后，义律就积极准备侵略战争。一八三九年四月三日，他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报告中就建议：英国唯有事先

丝毫不动声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才是对付中国的最恰当方式。在以后的多次报告中，这个家伙一再催促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

林则徐在销毁鸦片后，一面坚持禁绝鸦片，要求进口贸易的外国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一面继续在军事上进行准备。他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督促广东水师进行操练，在虎门口内新建及修理炮台炮位，增添大炮至三百尊；在武山、横挡山之间，江面最狭的地方，安置了两道木排铁练，以备堵截英国侵略者兵船的闯入；在尖沙嘴一带，也新建炮台两座，安置大炮五十六门，又在各水陆要隘，派驻了军队。

林则徐也曾号召民间自行组织乡勇团练，又招募但户（住在船上的城市贫民）、渔民壮丁五千人，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贍家费银六元，组成水勇，教练他们袭击敌船和刺探敌情的技能，在必要时协助水师作战。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进攻的面前，林则徐主张抵抗，有别于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投降派，但是林则徐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他和人民虽有一致的地方，可是他和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在招募但户、渔民组织水勇时，又害怕他们。他感到“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他规定在招募水勇时，要“查明亲属，取具的保”。如果感到不可靠，就加以遣回，“妥为管束，以杜后日为非。”这就表明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成员，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抵抗侵略。

义律面对着林则徐的坚持禁烟和积极设防，他一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一面命令英船拒绝具结进口贸易，继续大搞武装走私鸦片，并不断进行武装挑衅。

一八三九年七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打伤当地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多次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拒不交凶，并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开庭审讯，有意严重地侵犯中国主权。林则徐命令停止供应英人物资，义律竟发动武装挑衅。九月五日义律率军舰两艘及快艇数只向九龙附近居民勒索食物，没有得逞。下午二时，突然向九龙口岸的三只中国水师巡船开炮轰击。中国水师船立即英勇还击，炮台也发炮应战。这一仗，中国水师“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而英国侵略军则吓得“瘫痪了”，“说不出话来”！一个侵略军分子在他的日记中招供说：“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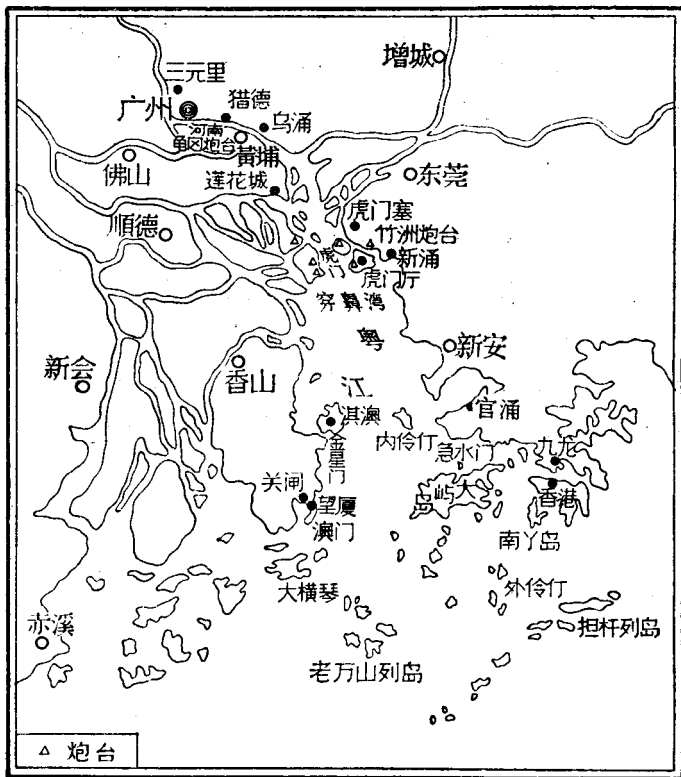
义律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长期阻止英国商船具结进口贸易，是与美国侵略者的支持分不开的。这期间，美国船代替英国人运货，或者干脆把英国商船挂上美国旗开进黄埔。后来，义律曾对美国鸦片贩子旗昌洋行的经理福士说：“亲爱的福士，（英国）女王得好好地感谢你！我们已经运进了所有的货物，也运出了充分的茶和丝。如果美国商行不在广州撑下去，英国商人恐怕会自己跑进去了，而我没有力量阻挡他们进去。”

这些都充分地暴露出鸦片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凶！

可是，义律并没有能够阻挡所有的英国船只具结进口贸易。一八三九年十月，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背着义律具结进口。接着，另一只英国商船“撒克逊”号也申请具结。

英商这种行动，使义律这个侵略分子大为恼火。十一月三日，当“撒克逊”号将要进口时，义律派出两艘英国兵舰拉着满帆赶了过来，横加阻拦，并首先发炮攻击中国水师船，挑起了激烈的穿鼻洋海战。水师提督关天培率水师船英勇抵抗，激战二小时，英舰一艘受伤，退往外洋。

义律在穿鼻洋挑衅失败后，仍不甘心。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三日，十天之内，连续六次在珠江口的官涌一带进行挑衅，都被打退。这是中、英之间的前哨战。一八四〇年一月，林则徐奉道光帝的命令在广州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附近形势图

## 四、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

商品、鸦片、大炮，是英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的三部曲。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多年，英国鸦片贩子就开始积极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准备与情报搜集工作了。一八二三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沿海做了一千多里的长途侦察旅行。一八二七年，这个家伙又在澳门创办《广州记录报》，公开鼓吹侵略。一八三二年，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派遣间谍分子胡夏米、郭士力，乘坐间谍船“阿美士德”号，用六个多月的时间，有计划地详细地搜集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从这以后，鸦片贩子就根据多年侦察的结果和胡夏米所得的情报，酝酿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甚至连运用多少兵力，使用何种舰只，都计划到了。英国鸦片贩子很快作了一份详细的侵略方案，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献策。

一八三六年与侵略中国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聚集了一百零九家和侵略印度与中国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

界巨头。它经常与英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或口头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一八三九年八月五日，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伦敦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立即于八月七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怎样挑起侵华战争的问题。会议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主持。莫克维卡同时也是一个鸦片贩子，他是专搞鸦片走私的怡和洋行在曼彻斯特的“机密代理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与侵华利益有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的主席拉本德，刚从中国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等。而这个会议的幕后操纵者则为另一个大鸦片贩子查顿。会后，他们会见了帕麦斯顿，共同策划发动侵略战争。

接着，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里兹、格拉斯哥、布里斯特等大城市的商会，一致主张对中国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叫嚷什么决不能“轻易放过这样一个战争的机会”。九月二十一日，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的正式报告后，帕麦斯顿立即狂妄地表示，对待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十月一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发动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负责向清朝政府进行军事和外交讹诈。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一八四〇年四月，英国政府组成了一支包括军舰十六艘，运输舰二十艘，

武装汽船四艘，共载炮五百四十门，士兵四千人的侵略军。乔治·懿律是这支侵略军的总头目。

英国政府给这支侵略军的指示是封锁珠江口，占据舟山群岛，北上天津，胁迫清朝政府接受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英国侵略者这样一个作战方案，几乎完全是根据鸦片贩子胡夏米、查顿等人所提供的情报与建议制定的。后来，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帕麦斯顿在他的私人信件上招供说：“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指示，那些指示如今已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满意结果，指的就是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里，帕麦斯顿明白地说出了英国政府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方案，是根据鸦片贩子的意见制定的，仅仅从这一点，就可清楚地说明这次战争的肮脏性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初，侵略军的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懿律率领侵略军到中国后，企图进犯广东。这时林则徐已由钦差大臣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由于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英军在广东未能得逞。六月三十一日，英军北犯厦门，又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

七月二日，英国侵略舰队开抵定海海面。当时，除广东、福建外，清朝政府在沿海毫无防备。七月四日，英国侵略军攻占定海。英国强盗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疯狂地进行抢掠。一个侵略军军官描写英军抢掠的情景说：“军队登了岸，



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掠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篋，街上堆满了书画、桌椅、日用器皿和粮食……这一切都被席卷而去，……直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抢的时候，抢掠才停止。”英国侵略军的这种海盗行为，不仅在定海是如此，而是贯串在整个战争过程中。

英国侵略军攻占定海后，把定海作为进军的基地，主力继续北上。八月十一日，侵略军到达天津海口，向清朝政府投递照会，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赔款、割地等侵略要求。

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为民族战争，和广大群众要求抵抗侵略的强大压力面前，清朝政府内部分裂为抵抗与妥协两派。一部分坚持禁烟、要求抵御外侮的官员构成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是他们的代表；一部分原来就反对禁烟，或者害怕对外战争动摇其统治的官员构成妥协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是他们的代表。后一派在清朝政府中拥有很大的实权。他们在禁烟运动进入高潮和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时，暂时保持沉默。定海失陷后，他们就纷纷跳出来指摘林则徐禁烟过激，惹了祸；侵略军到达天津海口，他们就公开出面向道光帝大进谗言，说“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并造谣说林则徐接受英国文书，私自销毁。道光帝看到英国侵略军已到天津，威胁到他的统治，又对林则徐等有所怀疑，很快发生动摇。他命令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琦善一接手就主张与侵略者妥协，发出英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即

使今年打退了敌人，它明年仍可再来，如果战端一开，战争便没个完”的投降论调。他主张用“好言相劝”的办法来应付敌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侵略者妥协投降。

琦善在和英国侵略者谈判的过程中，无耻地胡说什么是在英国人受虐待了，假如英军在广州进行报复，也是林则徐罪有应得。这个琦善还向英国侵略者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州，一切问题待到广州谈判，就可以满意解决。

英国侵略者的要求既然有了着落，便声称同意清朝政府的办法，回广州等候谈判。九月中旬，英国侵略军陆续南撤。

英军从天津海口南撤后，道光帝以琦善退敌有“功”，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负责和英国侵略者谈判。几天后，清朝政府便以“办理不善”的罪名，下令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英军侵占定海后，因疾病流行，数月间死亡四百八十八人，超过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患病住院的则达一千五百余名。当时海上交通主要依靠帆船，从英国到中国来要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般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兵员、物资补充十分不便。而定海人民，在英军侵占后，拒绝与侵略者往来。农民群众经常伏击英军，把敢于出定海县城抢粮、抢牛和夺鱼的侵略者抓住或者打死，使盘踞定海的侵略军处境极为狼狈。懿律南下经浙江时，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便和负责浙江防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进行谈判。伊里布是一个镇压云南人民起家的满族官僚，原任两江总督，定海失陷后，清朝政府派他到浙江来收复失地，可是这个伊里布也和琦善一样，是个一味主

张妥协投降的民族败类。十一月六日，伊里布与懿律达成停战协定，使英国侵略者可以从浙江方面抽出兵力，加强在广州的侵略力量。

琦善于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达广州。为了讨好英国侵略者，他一反林则徐所为，在军事上实行撤防，裁减水师，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水勇，听任英军派小艇探测内河水道，决心向英国侵略者妥协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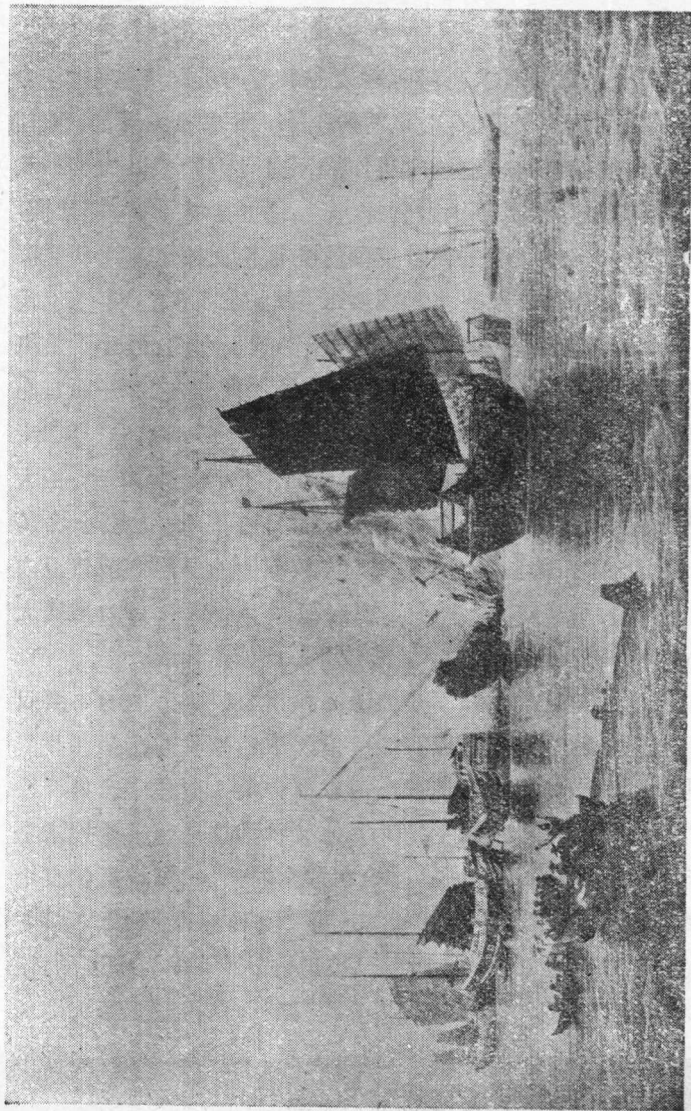
十二月初，琦善与查理·义律开始谈判。这时懿律已生病回国，伯麦接替懿律为侵略军的总头目，而与清朝政府的谈判，则由义律负责。在谈判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几乎全部照单接受，只有对割让香港，表示不敢作主，但答应向道光帝代为请求。

但是，英国侵略者对此却不愿耐心等待。为了压迫琦善彻底投降，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军突破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陞父子无援力战牺牲。侵略军长驱直入虎门，关天培率守军奋力抵抗，并派人入广州城求援。琦善置之不理，连夜派人赶往穿鼻洋，与义律签订了包括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商务，割让香港等条款的《穿鼻草约》。

清朝统治阶级对英国侵略者屈膝求和的态度，在广大群众中间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群众反对妥协的斗争日益高涨。浙江镇海曾爆发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请愿活动，反对伊里布与英军停战后撤退镇海的防兵。有人到官府投书，要求收复定海。当英国侵略军宣布根据《穿鼻草约》占领香港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对，地主阶级中主张抵抗的士绅和

知识分子，也集会要求当局驱逐侵占香港的英国侵略军。许多倾向于抵抗派的官员，这时也纷纷上书，要求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继续对英作战。道光帝原来以为英军北上天津，只是为了报复销毁鸦片，一旦惩办了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国在广州继续通商，英国就会很快交还定海，从此罢兵。不料义律提出了更多无理要求，而且态度蛮横，定海也没有立即交还，使他感到“天朝”的尊严受到很大的损伤，于是道光帝又倾向于“主战”。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道光帝一面宣布不准赔款，一面命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增强防御。一月二十七日，当英军攻占大角、沙角两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他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宣战。命令伊里布即日进兵，收复定海；命琦善激励士卒，奋勇向前。过了三天，又派他的皇侄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到广州去和英军作战。

道光帝的宣战，并不是他决心要抵抗侵略，他的主要目的，不过是要对英人“示以声威”，借此取消烟价的赔偿和收复失地。所以当琦善捏造情况，请求准许英人居住广东外洋香港地方，以便交换定海、沙角时，他又认为这是琦善委屈求全的“苦衷”，准备就此了事。恰恰在这个时候，广东巡抚怡良上书揭发琦善私立《穿鼻草约》，答应赔款，私割香港的罪行，并说岛上的驻军早被驱逐，居民已被迫“归顺”，成为英国的“臣民”。既赔款，又失地，破坏了“天朝皇威”，气得道光帝大骂琦善“辜恩误国”，立即下令锁拿琦善进京。同时，严令奕山等迅速集合各路军队，“一意进剿”。



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清朝水师与英舰在广州海面交战

这时，英国侵略者已知道清朝政府增兵广东，立即先发制人。二月二十五日，英军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率守军抵抗，琦善（当时锁拿琦善之令尚未到广州）不发援兵。关天培受伤多处，还亲自燃放大炮，坚守炮台，因寡不敌众，虎门炮台失陷，关天培与将士数百人壮烈牺牲。二十七日，英舰开进内河，乌涌炮台的守将不战先走，乌涌失守。琦善又将二沙尾要隘的守军撤走，使得广州的门户大开，三月，侵略军逼近了广州城郊。

这时，参赞大臣杨芳已先于奕山、隆文到达广州。杨芳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大刽子手，但是他在对外战争中却是个十足的投降派。三月十日，英军分路进攻，杨芳退入城内，束手无策。由于作战关系，当时有两万吨英国商船不能进口，又有三千万磅茶叶不能运出，仅茶叶一项，英国政府就可以得三百万英镑的税收。因此，义律向杨芳提议停战通商。杨芳正求之不得，立即同意。于是，从三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一日，广州出现了停战通商的局面。

广州的暂时停战，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的缓兵之计。三月底，义律和伯麦去印度调集援军，准备大举进攻。清朝政府方面，奕山四月十日也到了广州。

奕山是清朝政府在广州战役中的最高负责人，他身上充分地反映出清朝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奕山到广州后给道光帝的第一个奏报，即说“患不在外而在内”，诬蔑主张积极抵抗侵略的广东人民，是“无赖之徒”。声称“防民甚于防寇”，诬指人民为汉奸，任意杀害。奕山对于人民的

恐惧与仇恨，深刻地暴露出清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间尖锐的阶级矛盾。

奕山有很大的虚骄心。他到广州后成天饮酒作乐，没有作战的准备，就想侥幸取胜。五月二十一日，奕山派军队夜袭英船。这时英国侵略者已从印度调来援军，早有准备。奕山的进攻，并没使英军遭受损失，倒使中国的民船被烧毁不少。第二天，英军发动进攻，到了二十五日，广州城外险要已全部为侵略军所控制，清军一万多人全部退入城内。英军在城外据四方炮台，居高临下，炮轰城内。二十六日，英军据汉奸报告，集中炮火，猛轰城东南角的贡院——奕山等一伙的住所。奕山等吓得慌作一团。在侵略者的炮火淫威面前，奕山等一小撮民族败类，赶紧在城墙上竖起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由里通外国的行商伍绍荣牵线，向英国侵略者求降，根据侵略军头子卧乌古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和约》的内容是：（一）奕山率清军撤出广州城六十里外。（二）于一星期内交付赎城费六百万元。自五月二十七日算起，日落前，交付一百万元。（三）英军暂驻原地，双方不得增加准备。如赎城费未能于七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七百万元，如未能于十四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八百万元，如未能于二十天内全部付清，即增至九百万元。全部付清后，英军撤出虎门。（四）赔偿英商馆损失三十万元。

《广州和约》既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也充分暴露出英国资产阶级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祖先所特有的古老

的海盗式掠夺精神”。<sup>①</sup>

英国侵略者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面前，虽然一时耀武扬威，但它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却立刻显露出纸老虎原形。

---

<sup>①</sup>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八六页。



## 五、三元里人民狠揍侵略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sup>①</sup>

同琦善、奕山等民族败类相反，中国人民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广州战役开始后，城郊的人民群众立即自动起来参战。香山人民组织水勇五百人袭击白鹅潭的侵略舰队，新安人民组织火船队三队，夜袭停泊在虎门的英国兵船。正在田间劳动的广大农民群众，也自发地跟侵略军展开了斗争。

正当广大的义勇丁壮和侵略军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候，奕山等民族败类却无耻地向敌人投降。奕山等人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不满和仇恨在迅速增长。为了把这种情绪镇压下去，奕山、隆文和杨芳这三个投降大员，共同出布告严禁人民对侵略军的侵略行为进行抵抗，并规定敌人上岸骚扰，也不准捉拿，如果违令就要按军法治罪。这就进一步暴露了清朝统治者保护敌人、镇压人民的丑恶嘴脸。

但是，人民群众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反侵略的斗争在二元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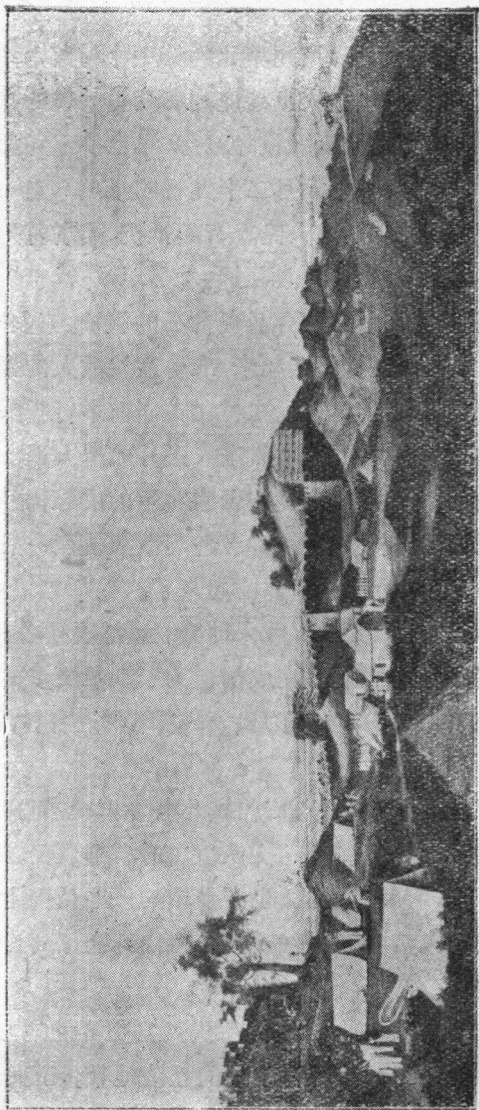
里激烈展开。三元里是靠广州城北的第一个村落，离城约五里。广州战役开始后，战火直接烧到三元里人民的身边。侵略军的暴行，清朝官吏的无耻投降丑态，早已使三元里一带人民怒火燃烧。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当一队侵略军来三元里抢掠时，三元里人民就奋起抵抗，当场打死侵略军七、八人。漏网的一些兽兵，狼狈逃去。

人民在斗争实践中必然会涌现自己的领袖。菜农韦绍光，首先挺身而出，号召全村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敌人的报复。在韦绍光等的带领下，全村人民在村北古庙前举行誓师。他们以三星旗为令旗，对旗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头二句是进退信号，末一句表明斗争的决心。经过一番布置，三元里人民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敌人拚死一战。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整个三元里沸腾起来了。

三元里人民知道，要粉碎敌人的骚扰，打败侵略者，决不是一、两个村子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和敌人战斗，他们推出韦绍光等为代表，联络附近各村，共同战斗。

在三元里代表的串联下，广州城北各乡群众，迅速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在这支队伍中有普通农民，有纺织工人和打石工人，有秘密会党，也有乡镇的一些爱国士绅。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各乡派代表到牛栏冈开会，商讨组织群众和战斗部署。

牛栏冈位于广州城北，南海、番禺两县交界的地方，离城约十二里，是萧冈、三元里各村之间的丘陵地带。五月二十九



四方炮台

日下午，各乡代表群集牛栏冈。会议决定：（一）各乡自成一单位，各备大旗一面，自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三）各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四）和敌人作战，不采取正面进攻方式，而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五）以牛栏冈为决战地点。会后，各乡代表赶回本乡，连夜动员，准备大战。

五月三十日的一大早，三元里一带人民，竖起了平英团的大旗，集合了几千人的队伍，向英国侵略军的营地——四方炮台挺进。这时侵略军正吃早饭，突然听见杀声震天，只见手里拿着长矛、大刀、藤牌、火绳枪，以及五颜六色旗帜的人民武装，漫山遍野而来，吓得英军司令卧乌古慌忙下令，吹号集合，除留部分侵略军防守四方炮台外，其余全部出动，分三路阻挡。他们携带着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除来福枪外，还有各式大炮。出动的侵略军不下二千人，敌人进攻广州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了。

当卧乌古率侵略军从四方炮台的高地上冲下来的时候，武装群众按原定计划，迅速后退，诱敌深入。当退到牛栏冈时，义勇们就在高地上整队以待，不再后退了。狡猾的卧乌古看到苗头不对，赶快下令后撤，可是已经晚了。忽然一声炮响，锣鼓齐鸣，牛栏冈周围，埋伏的七、八千武装群众突然出现。敌人慌了，急忙施放火箭，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挡潮涌般的武装群众。三元里人民的反攻开始了，敌人军需少校毕霞首先毙命。卧乌古急忙下令分两路冲出，向四方炮台撤退。

当侵略军突围时，义勇们立即从两翼向敌人进攻，并把敌人的殿后部队包围起来，加以围歼。侵略军的一个上校军官招供说：“在我军分队后撤时，中国人立即密集到我军后方和两面侧翼，坚决地、勇气勃勃地困扰我军，迫近到我兵刺刀的跟前，并抓紧每一个有利的机会（如在我军渡越小河，或在小径和村中小路单排前进的时候），和我军肉搏。”

侵略军拚命地想逃回四方炮台，可是在撤退中，雷雨大作，火药全被淋湿了，火枪已无能为力。大雨把田间的小路淹没了，稻田变成一片汪洋。侵略军的皮靴走在泥地上又重又滑，狼狈不堪；三元里一带一百零三乡的人民，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精神抖擞，愈战愈勇。在战斗中，就是原来规定要撤退的妇女老弱，也都挥着锄头、铁耙前来助战，甚至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在喊杀助阵。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正如当时人们所描写的“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充分显示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威力。

在义勇们追击下，有些敌人躲到瓜棚豆篱下，有些跌倒在水田里，有的把枪放在地下，跪下举手投降，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已经威风扫地。

下午四时左右，卧乌古带着狼狈不堪的侵略军，逃回四方炮台。这时他们发现殿后的第三十七团第三连不见了。于是敌人再派出拥有最新武器（不怕雨淋的雷管枪）的部队，出来抢救。原来敌军这个连，在后退中被义勇们包围了。这批侵略军为了顽抗，一个挨一个地结成方阵，一步一步地向后移

动。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被歼灭的命运，没有料到英勇机智的中国人民，却想出了巧妙的方法，来收拾这些顽抗的家伙。义勇们使用带钩的长矛，把敌人一个一个的从他们的方阵中钩出来，夺下他们的洋枪，然后再收拾他们。

这股被围攻溃败的侵略军，在卧乌古派出的援军接应下，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逃出重围，但愤怒的武装群众跟踪追击，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直到三十一日的早晨。

三十日这天的战果是很大的。在广州城西北郊一带十几里的战场上，到处倒着敌人的尸体。据当时的记载，人数在二百以上，伤者更多，此外还生俘侵略军十余名，并获得大量战利品。

三元里大捷的消息，很快地就传播到广州城郊各个乡村。三十日这天，因路远不知消息的各乡，也组织起来，连夜赶到四方炮台。到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包围四方炮台的武装群众已达数万人，旗帜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国侵略军面对着这些生气勃勃的武装群众，已束手无策了。

就在这两军对峙的紧张时刻，八千多名全副武装的清朝军队，根据《广州和约》撤离省城六十里的投降条款，偃旗息鼓地从广州城里撤出来。他们对正在包围着侵略军的数万武装群众，好象没有看见一样。这种情景暗示了被困在四方炮台高地上的侵略军，于是卧乌古立即写信派汉奸混出重围，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卧乌古威胁说：清朝政府如果不立即设法解散群众的队伍，英军就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官方认可的，将废除《广州和约》，向前攻城，并烧毁附近的每一个村镇。

早就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奕山，看到卧乌古的恐吓信后，立即派余保纯出城为侵略军解围。

汉奸余保纯匆忙赶到侵略军司令部，再三表明：清朝当局并不知道群众的行动，更没有清朝军官在武装群众之中。这个无耻的汉奸，为了表示他的“忠诚”，要求英国侵略者派一军官陪同他去和武装群众谈话。于是卧乌古派侵略军陆军上尉慕尔，带着翻译员，拿着白旗，陪同余保纯向群众队伍走来。群众见余保纯同英国鬼子并肩走来，非常愤怒，立即用火绳枪指向慕尔，不让他走近。这个家伙只好溜回。

余保纯知道众怒难犯，小心翼翼地要求群众退去。可是群众恨透了他，当面骂他是通夷卖国的无耻汉奸。群众的怒斥声响成一片。余保纯看见势头不对，便转身去找地主士绅，要他们设法解散群众，并且威胁说：这件事是你们和群众一起搞的，如果大家不散，出了问题，一切要由你们负责，六百萬元的赎城费，也要由你们出。士绅们激于一时义愤，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参加了这次抗英斗争，但他们是地主阶级分子，和清朝官吏本是一体，当然不会抗官。他们给余保纯这样一吓，便动摇了。有些暗中溜了，有些还帮余保纯作说客，欺骗群众散去。余保纯这才“保”住了他的外国主子，在群众咒骂声中，狼狈逃跑。

四方炮台解围后，英国侵略军如惊弓之鸟，不敢在广州多作停留，第二天，就夹着尾巴，悄悄地退出虎门。

群众是暂时分散了，斗争的烽火并没有熄灭。六月七日，当英国侵略者为了保存面子，由义律出布告为侵略军的惨败

辩解的时候，群众立刻贴出布告加以驳斥，并且约期再战。这时，侵略者已尝到了人民铁拳的味道，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起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个战斗，是近代中国人民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它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它鼓舞了广东和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人民知道“官兵不可恃”，“鬼子不足怕”。它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船坚炮利不可战胜的妥协投降论调；表明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旦武装起来，就能够战胜优势装备的外国侵略者。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餘鄉，衆矜者為不共戴天。蓋

英逆事，照得向來英逆素不安分，屢犯

天朝，昔攻沙角炮台，戕害官兵，戕

皇上深仁，惡加誅，且示懷柔，彼尚不知感，思猶復包藏禍

深入重地，亂施火箭，燒害居民，攻及城池，日無各息。

朕差大臣，見城廂內外遭殃，議約戢兵安民，英逆理宜得此

好意，即休。胡乃貪勝不知輸，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容縱

兵卒，擾亂村庄，搶我耕牛，傷我田禾，燬我祖墳，淫辱

我婦女，鬼神共怒，天地難容。我等所以奮不顧身，圍困

義律於北門，斬首百，置於南岸，亦等逆黨。試思此時，

若非我，府尊為爾解此厄，各逆其得保首領以下，船隻，

今爾出亦當途辱為，將軍大人無功，揚言於衆，與

百，臺中，其卑視我，此地無人，實甚。我等固是氣憤成

雲，志除妖孽，飽德之義士，發助兵糧，荷鋤之農夫，整

利刃，務使兒子無雙影留存，鬼胎無片帆回國。而後已，亦

到爾其卜日交戰，為此誓亦。

## 六、侵略战争的扩大

奕山等战败投降，可是却向上谎报，把大败说成“大胜”；把交赎城费六百万元，说成是代行商清还商欠；把被迫退出广州城，说成是下乡弹压土匪。最后要求道光帝批准英人的请求，准允恢复贸易。而那位道光帝居然以不值得与英人计较，并且已经给以惩罚为理由，表示同意恢复通商。于是，这一群自欺欺人的腐朽清朝贵族，就恬不知耻地在纸面上大获“胜利”了。

可是，正当清朝统治者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下令沿海撤防的时候，没料到英国侵略者又来了。

英国政府于一八四一年四月接到义律关于订立《穿鼻草约》的报告后，认为勒索太少，大为不满。英国政府解除了义律在华的一切职务，否认《穿鼻草约》，改派以侵略印度臭名远扬的狡猾政客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来中国扩大侵略战争，索取更多的权益。

一八四一年八月初，璞鼎查到澳门后，向广东地方当局提出议和纲要一份，并通知奕山说，义律已经回国，英国政府已改派自己为全权代表。声称如果中国不能派出全权代表，接受纲

要上的全部条款，他就北上进攻。

奕山还没来得及将这份“纲要”送到北京，璞鼎查已率侵略舰队于八月二十五日突袭厦门。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力战牺牲。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

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这才从太平的幻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地通知沿海各省加强防务。可是，这时英国侵略舰队，已开到浙江海面，准备再一次攻打定海了。九月二十五日，英国强盗向定海发动进攻。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坚决抗敌，激战六昼夜，相继战死，定海于十月一日再次失陷。这次定海战斗，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连参加这次战斗的侵略军官也说：“有些汉军军官表现得很英勇，汉军总司令葛将军在长列炮台中阵亡。他的僚属和我们（指英国侵略军）的军队短兵相接，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定海战斗，给英国侵略者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侵略军死伤多人。

接着英军进攻镇海。扼守镇海城外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英军刚刚登陆，他就率部逃跑。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力战不支，投河死。十月十日，镇海失陷，三天以后，英军又侵占宁波。这次镇海战斗，虽因余步云的逃跑而影响了军心，但许多士兵仍然自发地进行了出色的战斗，跟侵略军多次肉搏，英国军官描述这次战斗说：“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奋死决战，显然有不战胜而战死的决心。”

英国侵略者侵占宁波后，任命了那个曾在“阿美士德”号间谍船上披着传教士外衣大干特务勾当的郭士立为“县长”，

开始掠夺浙江省这个最富庶的商业中心。英国强盗们仅仅在宁波府库中就抢走了十二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又抢走了可供侵略军两年之用的粮食。

浙江战争使得事态更严重了，清朝不仅丢失了三个城池，而且死了几个总兵，一个总督，“太平”统治保不下去，不得不准备应战。十月十八日，道光帝任命他另一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牛鑑为两江总督，调集内地数省的军队，前往浙江办理军务。

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代表着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势力，他所走的也几乎是和奕山一模一样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老路。他带着大批的亲戚故旧和王公大臣所推荐的随员，从北京去浙江一路游山玩水，成天沉醉于酒色歌舞之中。十二月初，奕经到苏州后，借口筹办军务，逗留苏州作威作福，驻扎一个多月，根本不做认真收复失地的准备。有人向他建议：招募民间乡勇，分散在宁波、镇海、定海附近，随时随地以小分队分扰敌人，等到敌人疲敝，再用大军出击。奕经同奕山一样惧怕人民，他不可能实行这个需要人民支持的作战方案。

一八四二年一月间，奕经忽然做了个梦，梦见英军纷纷上船逃往外洋，周围的人都说这个梦是个“吉祥的预兆”。文蔚附和着说，他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奕经非常高兴，决定马上出兵。于是从嘉兴移往绍兴。这批纨绔子弟到达绍兴后，却又“饮绍酒大乐，日在醉乡”，一心一意只等待梦里所幻觉的胜利到来。

三月八日，奕经分兵三路，企图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

三城。奕经以为三城皆有内应，收复不成问题，严令各军不许携带火器，只准用刀矛短兵。英军探知奕经用兵计划，早有布置。进军宁波的军队入城后，遭到英军从街道两旁的房屋中夹击，死伤过半，仓惶退出。其他两路亦因指挥错乱，同时溃败。英军乘机攻陷慈溪，奕经等逃往杭州，从此主张妥协，不敢再战。奕经和奕山一样，经过了轻举妄动，一触即溃，丧胆求降的三部曲，结束了浙江的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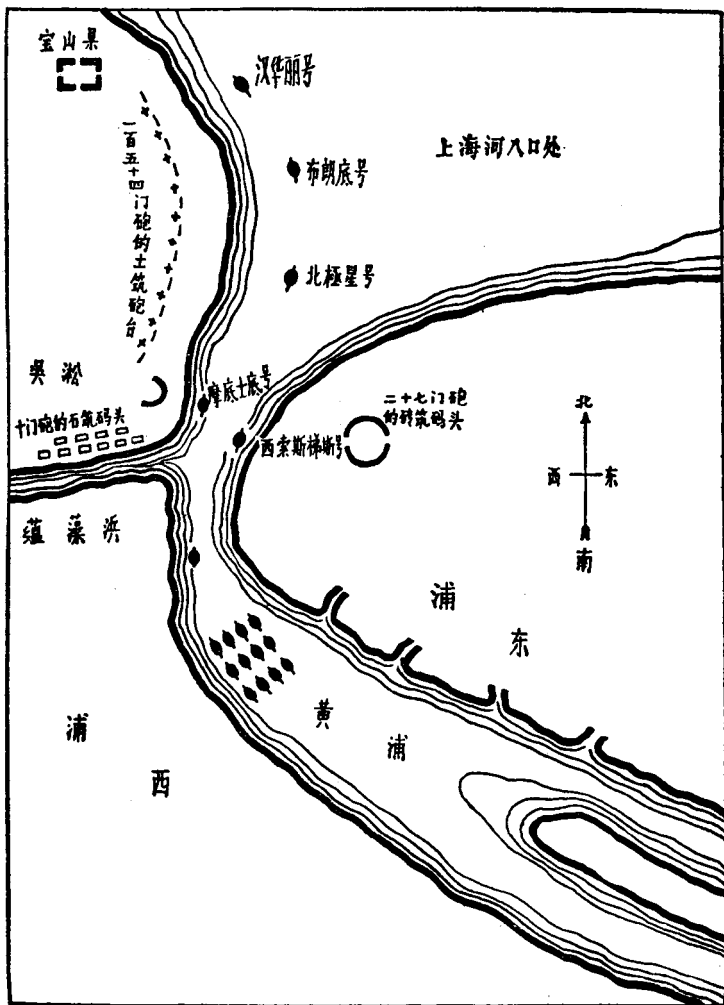
奕山指挥的广州战役和奕经指挥的浙江战役，是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出兵对抗英国侵略者的最大两次战役。每次战役都有两万左右军队参加，但是两次战役都在盲目、混乱和错误的指导下归于失败。而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和人民的尖锐对立。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但不敢组织人民的力量，而且对人民一直抱敌视态度，当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时，清朝统治者反而加以限制、破坏，甚至把抗英的人民诬蔑为汉奸加以陷害。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在这次战争中不能不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清朝统治那样腐朽，那末，总数不过一万五千人，所乘的炮舰、轮船和帆船不过百艘，象这样一支远离本国的海盗式的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清朝政府在战争中的一再失败所暴露的腐朽脆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恨。庞大的战费以及官吏们的借战争以自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军队的毫无纪律，勒索骚扰，直接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人心动摇，怨声四起，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了。各地农民的抗租和小规模的斗争越来越多。

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崇阳爆发了以钟人杰为首的会党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使清朝政府受到很大的震动，使它感觉到如果不赶快结束对外战争，就可能出现一个所谓“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帝上了一个“十可虑”的奏折，劝他赶快向侵略者妥协。刘韵珂十分强调国内形势不稳，特别提醒道光帝，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人民很可能乘机起义。其他妥协派官员，这时也纷纷活动，竭力主张停战议和。

人民的反抗斗争发展下去将直接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同意英国侵略者提出的通商、赔款、割地等要求，对地主阶级的统治暂时并无严重威胁；因此，清朝统治者宁肯与外国侵略者妥协，谋求和议，结束对外战争。自奕经在浙江战败后，道光帝就下令，不准再对侵略军进行抗击，不准人民起来捉拿侵略军，谁要杀死一个侵略军，不但要杀头，还要对上面的官员治罪。同时派满洲贵族盛京将军耆英，和原来因与侵略者妥协而被撤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浙江议和。

耆英与伊里布到浙江后，向侵略军投递照会，要求停战议和，并主动送还英国俘虏，讨好侵略者。但是璞鼎查从传教士的谍报中得知清朝政府正加紧在天津大沽口设防，长江下游一带兵力空虚。他又知道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南京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是清朝政府最重视的地方。因为江南的大量漕米和税银，都要集中在南京，经由镇江从运河北运。如果攻占南京，就等于卡住清朝政府的咽喉，使它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因此璞鼎查拒绝议和，并决定入侵长江，切断



英国侵略军侵犯吴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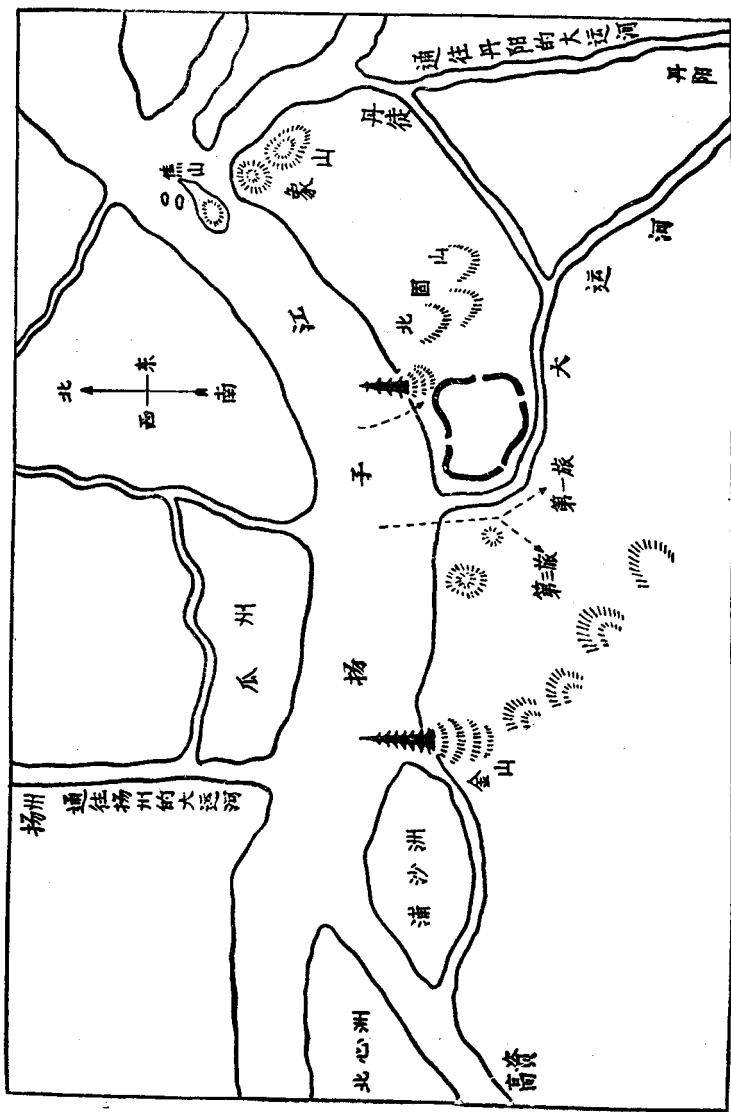
运河，直趋南京，以胁迫清朝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全部侵略要求。

一八四二年五月初，侵略军撤出宁波、镇海，以舟山为基地，攻陷浙江海防重镇乍浦，接着开始进犯长江。

吴淞位于长江口，是长江门户。在吴淞与宝山之间十多里的江岸上，筑有一长列炮台(西炮台)，在蕴藻浜入黄浦江的入口处的北岸筑有炮台一座，另外在蕴藻浜对岸的浦东筑有炮台一座(东炮台)。英军进攻前，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驻守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鑑，率军三、四千人驻宝山。六月十六日英军开始进攻后，陈化成坚守西炮台，站在最高点，冒敌人的密集炮火，指挥守军发炮还击。激烈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击伤侵略军舰数艘，使侵略军不敢从正面登陆。于是，狡猾的侵略者，以小型的舰艇开进蕴藻浜，强行登陆，打算经吴淞镇后面包抄西炮台的侧面，但遇到守军的誓死抵抗。牛鑑听说陈化成击伤了英舰，也从宝山率队增援。但牛鑑这个腐朽的官僚，在敌人的炮火面前，居然还摆列总督仪仗，招摇过市。敌舰发现后，发炮轰击。牛鑑一听炮声，便从轿中逃出，丢掉帽子和靴子，混入士兵中乱窜，全军溃败。于是侵略军趁机从西炮台的正面登陆。陈化成率队英勇抵抗，用长矛和侵略军进行肉搏，表现了勇敢的战斗精神。但是这时西炮台已腹背受敌，陈化成负伤多处，力战身死，西炮台亦随之陷落。与此同时，对岸的东炮台亦被攻陷。侵略军乘势占领宝山、上海。

侵略军占领上海共六天。这批强盗除向上海人民勒索赎





英国侵略军侵犯镇江图

城费五十万银元外，又在上海城内和四郊大肆抢劫。他们在城隍庙的庭园内，将屋里许多精巧的装饰品拆下来烧火；抢劫典当的仓库，在初夏季节里每个人穿上“镶着高贵皮毛的绸子和缎子的外衣，手里拿着绣花的扇子”，酗酒作乐。这就是帝国主义强盗们所鼓吹的“西方文明”！

六月底，侵略军的增援舰队，相继到达吴淞口外。七月初，沿长江上窜。

长江下游近海处非常广阔，两岸半为黄泥掩盖，江中沙滩甚多，水道曲折，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工事。但是，自从浙江战役失败，清朝政府推行妥协、投降政策之后，在吴淞口以上两岸地区根本没有加强防务。牛鑑自从宝山逃回南京后，更认为侵略军船坚炮利，不是依靠兵力所能制服的，并无耻地下令各州县看到侵略军舰队，不但不准开炮，而且要赠送牛、羊、酒等食物。这样，就使侵略军得派小船测量河道，沿江西犯。

七月十五日，英国侵略舰队开到镇江江面。

镇江城形势险固，居民十万户，商业繁盛，论人力地势都可以坚守，阻止敌人进犯南京。但实际上，军备却很虚弱，仅有副都统海龄的驻防旗兵一千多人，和从外省调来的湖北提督刘允孝所部的一、二千人。二十一日，英军七千人登陆进攻，刘允孝惧战逃跑，侵略军不战而占领城外阵地，集中兵力进攻城垣。侵略者用炸药轰开镇江城的西门，并用云梯攀登城墙，冲进城内。城内守军对英国强盗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一个侵略军军官记述说：“在这里，满兵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

陷的。”“很多这些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

镇江守军的英勇抗战，使英国侵略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侵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以极残忍的手段施行报复，又一次发泄了英国强盗的兽性，镇江居民被烧杀掳掠，非常残酷。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一面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斗争精神，一面痛责英国侵略军的残暴行为。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 185 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sup>①</sup>

镇江城虽然失陷了，可是当时人民抗英运动却正在发展。同时由于侵略军中霍乱流行，士兵大量死亡，敌军几乎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侵略者招供说：“不出一个星期，只是九十八团一个团就有四十个人因患霍乱而死去”，“实际上，不论是战舰，抑或属于运输队中的船只，每条船上都有很多病人。由于

<sup>①</sup>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人手缺乏,有些运输船只后来竟无法驾驶。”“贮藏船‘欧琴’号上发生了可怕的时疫,船上除了三个水兵和一个侍者得免于难外,其他的人,从船长到军官和绝大部分水兵都病死了。”这种有利的形势,如果能够坚持抵抗或实行封锁,断绝物资供应,英国侵略者就绝对到不了南京。但是,由于腐朽的清朝政府采取了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尽管有人民、士兵和个别将领的英勇抵抗,和极为有利的形势,都不能挽救战争失败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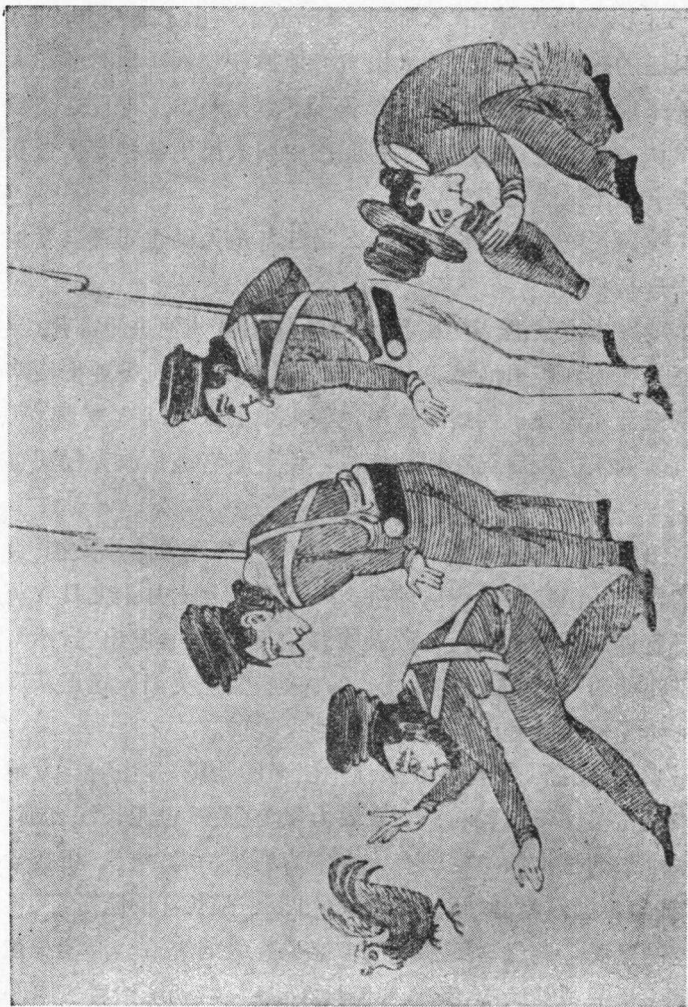
## 七、闽、浙和沿江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国侵略军足迹所到之处，随时都遇到人民的武装反抗。福建、浙江以及长江下游的人民，也和广东人民一样，在这次反侵略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的反抗精神。

一八四一年八月，英军攻陷厦门，四出抢劫，有乡民陈氏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抵抗，使侵略军不敢久占厦门，退据鼓浪屿。

英军进攻镇海，浙江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封锁、防守海岸，击退敌人的侦察船，砍伤并活捉了敢于登岸抢劫的该船副头目啍哩等多人。

英军侵占镇海、宁波后，有徐保、张太火、盛大才等人组织“黑水党”，到处打击敌人。“黑水党”人平时分头隐藏在宁波城厢内外，在河中备有八桨快艇多只，常在夜间四出打击敌人，弄得英国鬼子每到夜晚，感到十分紧张。“黑水党”的武装群众，只不过是有一支罢了。事实上，当时在镇海、宁波地区，到处都有人民群众自发地武装起来进行斗争。浙江人民的自发斗争，曾给英国侵略军以很大的困扰。这种情况，在侵略者的记载中，常常透露出来。例如，一八四二年二月十八



英国侵略军掠夺中国人民财物

日，英国侵略军运输船“衣那”号靠岸上水，由于退潮搁浅时，这只船的头目，就被当地人民机智地擒获惩处。当时浙江人民曾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俘获了不少侵略军。据侵略者自己供认，在他们占领宁波的后期，被中国人民用各种方法俘获的就有四十二名之多。

英国侵略军进犯长江以后，沿江各地人民也同样自发地起来进行抵抗。

英军进占吴淞、宝山、上海，又企图沿苏州河进犯苏州。英船三只，在松江强迫渔民王在坤作向导。王在坤机智地把侵略者诱至河水浅处，侵略军虽中途换乘小的平底船“麦都萨”号冒险闯入，最后仍在卯河搁浅，使侵略者被迫放弃侵犯苏州。

镇江失陷前后，沿江人民曾采取了夜间顺风施放火筏、火船的办法，阻挠敌人舰队前进。一八四二年七月十九日（英军进攻镇江城的前两天），敌人的海、陆军曾联合发出“告示”，用恐吓的语言，要人民不要用火筏、火船焚烧英船。这正从反面证明了侵略者是十分畏惧人民的火攻的。

瓜州、仪征一带居住在长江中船上的盐民，是当时自发地起来抗击英国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英军进犯长江之前，地主阶级的抵抗派中就曾有人上书清朝统治者，建议“招抚盐民”抗击英国侵略者。认为这样既可以增强长江的防务，又可以控制盐民，避免盐民乘机危害地主阶级的统治。清朝统治者是一贯敌视盐民的，英军入侵长江以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强调要“防范”盐民，诬蔑盐民可能与侵略者勾结起来，危害其统

治。但是，事实上，当侵略军侵入镇江江面一带后，广大盐民立即就用实际的抗英行动，粉碎了地主阶级的无耻谰言。可是，在统治阶级眼中，盐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也是危险的事情。七月十八日（英军进攻镇江城的前三天），仪征的大盐商汉奸颜崇礼，竟然携带“礼物”，跑到当时停泊在仪征附近江面的英国军舰上，卑鄙无耻地自愿向侵略军缴出扬州赎城费五十万元。同时向侵略者告密说，盐民是一支不受清朝政府约束的反英力量，唆使英国强盗于夜间突然炮轰老河影盐民居住区。当时火焰蔽空，数千盐民横遭残害。这是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镇江失陷了，清朝统治者加紧进行妥协、投降，但人民的抗英情绪仍然极为高涨。

在镇江一带，人民采用了夜袭的办法，不断给英国侵略者以困扰。一个侵略军军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英军侵占镇江以后的情形说：“夜间敌人的一些零星部队，不时袭击我军营房，使我们时刻惊醒；这对于我们军队来说是最伤脑筋的事，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抵抗攻击，这样就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了。”这个侵略者所说的“一些零星部队”，是他的误解，事实上不是什么零星部队，而是对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的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进行战斗，至于说这种抵抗办法，使他们感到“是最伤脑筋的事”，这倒是事实。

在靖江，人民组织起来严惩了敢于胡作非为的侵略者。八月十四日留驻在江阴的侵略军到对岸的靖江骚扰，从巽河登岸，勒索供应，靖江人民大呼：“洋鬼来了”，群起抵抗，从城墙



上用石头击死闯入城内窥探虚实的侵略军，城外群众也痛击敌人，侵略者仓惶逃窜。

为了对付前来报复的敌人，靖江人民协同地方官兵，连夜积极组织抗击力量，修理抬枪，掘出埋在土里的大炮（英军侵入长江后牛鑑下令撤去的沿江大炮），削竹竿为兵器，迅速地组织起一支约千人的群众武装力量，固守堤岸，迎击敌人。第二天（八月十五日），英船三只果然从对岸江阴开来，妄图报复，全城人民奋力抗击，击退英船，迫使侵略军不敢再犯靖江。但是这时正在进行投降活动的两江总督牛鑑，听到靖江人民的抗英，竟诬靖江人民为大胆多事。

此外，大江南北人民自发的抗英运动的发展，也极为普遍和迅速。据当时河道总督麟庆奏称：当时苏北沿江各州及夹河各乡，绅民捐资团练义勇，共计有九万名之多，自动捐献铜铁铸造大炮者极为踊跃。江南苏州省城也招募壮丁一千七百余名，其他各县尚缺统计。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到八月短促的时间内，随着英国侵略军的深入，长江南北人民武装发展到十余万人以上，可见当时人民抗英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各地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英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 八、《南京条约》

清朝统治集团，早在浙江战败之后，就已倾向投降。及至英军侵占镇江，清朝政府的投降要求就更迫切了。这一则是因为英军已深入长江下游，切断了南北交通，为英国侵略者所吓倒；再则也由于人民起义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如果不赶快结束对外战争，它就抽不出力量来镇压人民的反抗。这一点，清朝统治者就是在侵略者面前，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出来。英国侵略者说，“中国官吏并不掩饰他们的急于求和。混乱、不满、暴动与日俱增，……须待和议成功后，才能派兵去剿。”

一八四二年八月六日，英国侵略舰队七、八十艘，陆续开到南京江面，牛鑑出面投降。璞鼎查认为牛鑑不是全权代表，“无权作主”，拒绝议和；声称如果清朝政府不立即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议和，英军将开炮攻城。这下子可吓坏了牛鑑，他立即飞报当时尚在无锡的钦差大臣耆英，要他赶快前来南京。八月十日英国侵略者以牛鑑等拿不出全权代表的委任状，再次进行恫吓说，假如清朝全权大使不能于明日黎明前拿出全权委任状来，英方明早即开炮轰城。伊里布、牛鑑连夜派人到英舰上去，表示奉有“永定和好”谕旨的钦差大臣耆英即可到，

并拿出道光帝的求和“上谕”。当时英国强盗故意做出将要攻城的态度，以恐吓着耆英、牛鑑、伊里布等一小撮投降分子，促使他们赶快无条件地接受全部侵略要求。英国侵略者这副其势汹汹的样子，看来好象很“可怕”，实际上它虚弱得很。英军全部的作战人员亦不过七、八千人，由于霍乱在侵略军中流行，士兵大量死亡，病倒在船上的更多。据侵略者自己招供，当时能够参加作战的仅有三千四百人，而防守南京的清军却有八千人之多，如果坚决抵抗，是完全有可能抵制英国强盗的。

牛鑑、伊里布既然派人按时送来了全权代表的委任状，侵略者见其恐吓已经奏效，立即换出另一副嘴脸。英国侵略者向清朝政府表示，英国“借与中国通商，岂敢无故得罪中国？今连年兵战实出万不得已”。还说什么现在既有“大臣可以作主，我们英吉利亦属情愿听候商议”，表示愿意谈判。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耆英赶到南京，立即派江苏按察使黄恩彤等与侵略者接洽具体投降条件。璞鼎查为进一步控制耆英、伊里布、牛鑑等，又于八月二十日要他们到英国侵略军的旗舰上参观访问，用军舰大炮来吓唬耆英等，使其不敢对他们的勒索讨价还价。这一着果然有效，后来耆英等向道光帝奏报投降的经过时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服。”充分暴露清朝官僚在侵略者大炮淫威下的卑怯心理！

在清朝统治阶级眼中，侵略者既然如此“可怕”，当然只有无条件投降。八月二十二日，清朝统治阶级的总头子道光帝，也发出了对侵略者“所求无不准允”的“圣旨”。于是，八月二十

九日，耆英、伊里布、牛鑑等，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出卖中华民族权益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也叫《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重大问题，如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又在广东继续谈判。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十月八日，又订立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是《南京条约》的补充。

通过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取得了如下各项重大权益：

(一)强占香港 早在一八三〇年，即有在华英商四十七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侵占中国沿海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是保护鸦片贸易)。首先倡议夺取香港的是律劳卑，他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海军据点。这个罪恶的意图后来终于在一八四一年由义律与琦善签订的《穿鼻草约》中加以实现。《穿鼻草约》签订了六天之后，英国侵略军即强占了香港。其后英国政府否定了《穿鼻草约》，但是可耻的英国侵略者却始终霸占着香港不再退出。《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侵略者再次把强占香港列为重要内容。

(二)勒索巨款 《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赔偿鸦片费六百万银元，军费一千二百万银元，商欠三百万银元，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六百万银元还不算在内)。这是英

国强盗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掠夺。

(三)开放五口 清朝原来只有广州是对外通商的口岸，而增加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是英国资产阶级多年的一贯侵略要求。一八三二年，英国侵略者派出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时，就着重地探测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个港口的水道，并搜集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南京条约》中所规定增辟的通商口岸，又恰恰是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就证明了强迫清朝政府增开上述四处作为通商口岸，是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开放为通商口岸，暂时满足了英国侵略者蓄意已久的欲望。广州是原来的码头，上海是长江的门户，其他三处是控制福建、浙江两省出海的口岸。由于五口的开放，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门户大开，再加上协定关税，资本主义的商品就从这些口岸象潮水般地倾泻进来，逐渐破坏中国原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又由于《南京条约》的规定，准英商带同家眷在五个通商口岸居住，《虎门条约》又准许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以后外国侵略者就有意曲解这些条款，利用各种机会，在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殖民地制度。外国侵略者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

(四)协定关税 《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就是说中国没有

权力确定自己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确定的话，就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由于这一规定，中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与英国侵略者共同议订便作为原则确定下来了。又由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极大部分主要货物的税率定为值百抽五，于是海关税率也变相地固定下来了。由于有这些规定，中国便完全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从此，中国海关就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外国侵略者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近百年来，帝国主义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象一群饿狼一样地吸吮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

(五)领事裁判权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倘其(中英人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是说，英国人如果在中国领土上犯了罪，中国的官吏无权根据中国的法律来判罪，而是要由英国的领事根据英国的法律来定罪。根据这一条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无论犯下任何罪行，中国政府都无权根据中国法律对他们给以罪有应得的裁判。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破坏。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利用这一特权，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一八四一年五月，帕麦斯顿给璞鼎查的训令中，已明确提出要掠取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是一条对中国的主权危害特别严重

的条款。依照这一条规定，中国只要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英国就可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条约中，都有同样的规定。这样，无论那国从中国取得了新的权益，就都等于英国取得了新的权益；而英国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取得新的权益，也就等于为其他侵略者掠得了新的权益。因此，各国侵略者就无形中结成了侵略中国的伙伴。

以上是《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主要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鸦片，在条约上却一字未提。据一个英国侵略分子在他的《缔约日记》里说，在《南京条约》签字的前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璞鼎查在耆英招待他的宴会上，曾经诱惑地说，如果放手让鸦片进口，公开收税，就可以减少走私，增加收入，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力劝清朝政府准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对璞鼎查的这种谬论，耆英等非但不加以驳斥，反而承认这种说法颇能言之成理。后来璞鼎查在《虎门条约》签订前，又派马里逊要求鸦片开禁，并交出照会一件，理由是以前中国禁烟，中英商人在海上照常贸易，结果“名禁实不禁”，因此不如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这样，中国税收必能增加。清朝官吏认为用不着在条约上规定鸦片贸易为合法，他们早向璞鼎查保证：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必不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在英国侵略者与清朝政府的这一谅解下，不久鸦片贸易就较战前更加兴旺。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指出，鸦片走私在鸦片战争后，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发展了。他说：“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

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sup>①</sup>

《南京条约》是英国强盗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副枷锁。它开始剥夺了中国的主权，标志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从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始勾结起来，加紧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而伟大的中国人民，就同国内外的敌人展开了长期的英勇的搏斗。

---

<sup>①</sup>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三九页。



## 九、美、法侵略者趁火打劫

英国侵略者一手挑起的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充商品市场、寻找殖民地而向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也替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打开了乘机勒索的道路。

鸦片战争前，美国的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美国的鸦片贩子贩运鸦片数量之多，仅次于英国，而其手段之狡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美资产阶级在打开中国的大门、压榨中国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美国侵略者一直是英国侵略者的帮凶。

一八三八年，禁烟运动开始后，美国鸦片贩子伙同英国鸦片贩子破坏禁烟运动。一八三九年，正当英国侵略者准备挑起侵略战争的时候，在广州的美国商人，于这年五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同英国、法国、荷兰联合一致，强迫清朝政府接受“凡中国埠头，俱要准外国人任意贸易”的侵略要求。

一八四〇年一月，这份请愿书送到国会后，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但是美国资产阶级却不赞成直接参加英国的侵华战

争，而是认为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对美国更为有利。于是美国政府便在鸦片战争期间，派加尼率东印度舰队来中国，以便乘机拣些便宜。加尼来中国后，为英军声援。美国的政客和传教士，在鸦片战争期间，竭力为英国侵略战争辩护。美国总统亚当姆斯于一八四一年发表演说，胡说“英国宣战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中国活动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则叫嚷：“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鸦片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的纪元的。”美国在这里完全是和英国狼狈为奸，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资产阶级眼看英国侵略者从中国得到了那么多的权益，非常眼红。于是决定利用清朝政府战后的困难，进行讹诈。

一八四二年十二月，美国总统泰勒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建议正式派代表来华，主持外交和商务活动。国会立即通过，并提出四万元美金，作为侵华活动之用。一八四三年五月，美国政府派遣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为专使，以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儿子韦勃斯特为秘书，来中国进行讹诈。美国政府在给顾盛的训令中指明，在中国新开放的口岸里，美国必获得与英国相同的通商条件，否则，美国与中国不能和平相处。

顾盛于一八四三年七月带战舰三艘前来中国，次年二月到达澳门。他首先以“进京”、“面见皇帝”来要挟清朝政府；后来更声明除钦差大臣外，不与其他官吏谈判，不承认两广总督程霭采为交涉对手。但是当时清朝政府并不愿与美国签订象《南京条约》那样的不平等条约，程霭采曾一再婉言拒绝顾

盛的侵略要求。顾盛见阴谋不能得逞，立即露出了海盗面目，大肆进行战争恫吓。四月二十四日顾盛在给程霭采的信中，叫嚷什么如果清朝政府拒绝美国的要求，将被看作是中国企图再与美国为敌。为着加强战争恫吓，这位海盗式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五月九日又写信给程霭采说：“除了原定绕好望角来华的美国舰队正在途中外，构成太平洋舰队的炮舰，也已受命前来中国。”

清朝政府果然经不起顾盛的恫吓，于是另派钦差大臣、卖国能手耆英到广东与顾盛交涉。耆英于五月三十日到广州，六月十七日，进驻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他为讨好顾盛，不等顾盛来见，即于十八日先往澳门拜会顾盛。在谈判过程中，顾盛以接受他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作为不进京的条件。七月三日，耆英接受了顾盛的侵略要求，双方在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侵华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泰勒在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他已将美国对华关系，放置在一个崭新的立脚点上，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以及其他利益之发展。这里所谓中美关系的新的立脚点，就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立脚点。它之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及其他利益之发展，是因为在这个条约里，狡猾的美国侵略者除借口“利益均沾”，获得英国从《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获得了在中英条约上所没有的、或者虽有而尚未明确规定的权利。

（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 中英《虎门条约》的第九条已规定了英侨和中国人发生争执时，英侨归英国领事裁

判，使中国丧失了司法的主权。《望厦条约》则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美侨由美国领事审讯，而且美侨与任何外国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要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这样，中国的司法主权就受到进一步的破坏。

(二)关于破坏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规定 在《南京条约》中关于关税问题，只规定了“秉公议定”的原则，《望厦条约》则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官议允。”这就是说，中国没有权力变更海关的税率，如果要变更的话，就必须美国领事批准。这样美国侵略者就进一步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

(三)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规定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四款与《虎门条约》第十款，本已开英国兵船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停泊的恶例。《望厦条约》第三十二款更进一步规定，美国兵船到中国各口岸“巡查贸易”，中国各港官员要负责接待。第二十六款又规定，美国贸易船只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停泊，“中国无从统辖”。这样外国船只出入中国领海，就如入无人之境，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

另外，《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准许美国人在五个通商口岸自行建设礼拜堂，成为后来法国要求清朝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的先声。条约的最末一款中规定十二年后修约，这就为列强日后进一步的勒索预先准备了借口。

《望厦条约》是比《南京条约》更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不久它又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的范本。顾盛在《望厦条约》签订后，得意地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顾盛这一段话，正是美国跟在英国后面趁火打劫的自我招供！

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驳斥美帝国主义头子艾奇逊的谎言时，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sup>①</sup>

紧跟在美国之后，法国也趁火打劫。

鸦片战争之前，法国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后。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也非常重视战争发展的情况，企图乘机牟利。一八四一年初，法国派真盛意来华，调查远东形势，从事侵略活动。英军进犯长江时，法国战舰“爱里贡”号和“费弗拉梯”号，在吴淞口鸣炮向英国侵略舰队致敬，并妄自闯入长江，侵犯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签订时，法舰“爱里贡”号的舰长余西尔以不速之客的身份赶到英舰“汉华丽”号，参加了条约的签订仪式。

法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的这些活动，都说明了它在窥

---

<sup>①</sup>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九四——一三九五页。

测方向，以求一逞。

《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政府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于是派遣拉蓴尼为专使，带兵舰八艘前来中国，进行讹诈。

拉蓴尼曾任法国驻希腊公使，是个手腕狡猾的政客。他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到澳门后，在正式谈判之前，有意不透露他来华真实意图，迫使耆英只得派人到澳门去从旁探听。这时拉蓴尼就故意放出各种空气：一会儿传说他要与中国结好，共同抗英；一会儿又传说他将占据虎门，与中国为难；有的人说他将要求取消天主教禁令；有的人又说他将北上进京，面见皇帝。探报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耆英摸不着头脑。这样拉蓴尼就取得了主动，而耆英则处于被动、焦急的等待地位。等到十月初正式谈判时，拉蓴尼已经详细地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掌握了清朝政府的情况，于是援引英、美先例，提出签订商约的要求。耆英等一贯认为“抚夷不外通商”，很快地应允了拉蓴尼的侵略要求，于十月二十四日在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也就是中法《黄埔条约》。

法国侵略者在《黄埔条约》中，不但轻易地取得英、美侵略者已经取得的各项重大特权，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而且还夺取了一些新的特权。《黄埔条约》最突出的地方，是除了给法国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及坟地等权外，又规定如果有人触犯了法国教堂和坟地，清朝地方官员就要严加“治罪”。这是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祸害的一条。这一条明确地规定了清朝政府要负责保护法国教堂和教士的安全，后来外国传教士就用这一条作为护身

符，到处进行公开的侵略活动。

但是侵略者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拉蓴尼并不以条约中规定的特权为满足，他又在条约之外，抓住天主教的弛禁问题，进行新的讹诈。

法国一贯以天主教作为向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康熙时(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在中国的著名法籍天主教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但是自从清朝政府于一七二四年初(雍正元年底)，宣布禁教以后，不许人民信奉天主教，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对于企图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法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为了打破清朝政府对于天主教的禁令，远在鸦片战争之前，法国就派有传教士长期居住澳门，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情况；并派遣天主教士乔装中国人，潜入内地，进行活动，千方百计地企图找到使中国取消天主教禁令的门路。《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政府认为胁迫清朝政府解除天主教禁令的时机已到。拉蓴尼来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求清朝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拉蓴尼到澳门后，通过住在澳门的法国天主教士加略利已经暗示耆英，他对其他要求可以放弃，唯弛禁天主教一项，一定要死命地咬住不放。

《黄埔条约》虽然给予法国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的特权，但是如果清朝政府不取消天主教禁令，法国侵略者要想利用宗教扩张其侵略势力，仍然是有困难的。因此，拉蓴尼决意于条约之外，坚持要求清朝政府取消天主教禁令。在拉蓴尼的胁迫下，道光帝终于在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黄埔条

约》正式签订后的十七天，批准天主教弛禁。

道光帝本来是想应付一下拉萼尼，表面上答允弛禁，却不公开宣布。拉萼尼决心要将侵略计划贯彻到底。一八四五年八月，他利用《黄埔条约》即将换约的机会，向耆英要求公布弛禁令；换约以后，他亲自到上海、宁波、厦门等地调查，十二月初回到澳门，以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为借口，要挟清朝政府正式公布弛禁令，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道光帝在这种威吓下，于一八四六年二月下令给各地官吏不许再查禁天主教。这样，法国侵略者完全实现了它的侵略要求。

法国侵略者在传教方面所夺取的这些权益，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起了极恶劣的作用。从此，外国侵略者的传教士们伴随着鸦片、商品、大炮，毫无阻拦地源源来到中国。他们一面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传迷信，麻痹人民；一面勾结官府，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坏事干尽，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仅美、法两国的侵略势力，随着英国舰队，伸入中国，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都跟着仿效。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当时是联合王国）等，也都先后前来要求正式订立通商条约，争夺权益。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本着所谓“一视同仁”的原则，一概准允。这样一来，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就不止向英国开放，而是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 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的地位，社会内部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又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这时开始，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毛主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sup>①</sup>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间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特别是洋布、洋纱的大量入口，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五个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首先受到破坏。四十年代中叶，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落。广州、厦门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手工纺织业是农村中的主要副业，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遭受破坏，说明了中国原来的社会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外国资本主义在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的同时，也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丝、茶的出口几乎直线上升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八五一年，茶叶的出口将及一亿磅，相当于战前的一倍。四十年代末，丝的出口量，也由战前的一万二千包，增加到二万多包。丝、茶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国内丝、茶的生产。江、浙一带的缫丝业，湖南一带的植茶业都有了较迅速的增长。在上海出现了茶厂，专门加工制造适合外国人需要的茶叶。这时中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为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所操纵，丝、茶贸易的数量和价格受外国商人所左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鸦片走私仍然是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鸦片的进口量从四十年代的三万七千箱，达到五十年代的约七万箱。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进口鸦片七、八十万箱，约合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了鸦片贸易走私的中心。上海和广州成为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据一八四八年统计，被称为“浮动堡垒”的鸦片趸船，全国计有三十五只（鸦片战争前共二十二只），仅吴淞口一地就停有十二只。一八四九年囤聚在吴淞口趸船上的鸦片，竟达二万二千九百多箱。白银

外流、银贵钱贱的老问题，较战前更为严重。一八四五年，银价高达二千文左右。当时佣工每年得钱十千，折合白银只有五两。烟毒泛滥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祸害更大了。

随着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侵略者在那里开设商行，经营贸易，扩大侵略势力。上海在五口中发展最快，英国侵略者有意歪曲条约，于一八四五年首先在上海胁迫清朝政府地方官员，将黄浦江边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的一块地方划为英国的“租界”。一八四八年，美国侵略者强占了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地方为居留地，后来又和英国的“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一八四九年，法国也夺取了上海县城以北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方作为“租界”。后来外国侵略者又利用各种机会攫取了“租界”中行政、司法和警察权，把“租界”变成“国中之国”。香港自被侵占后，英国侵略者在那里大事经营，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一八四九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驱逐在澳门的中国官吏，拒交地租，强占澳门。这样，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就出现了第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

在这些城市里，买办商人已开始出现。他们有的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货物，专门为资本主义侵略者经济侵略服务。但是，这时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多，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不过由于他们的活动，更便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扩张进出口贸易；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取厚利，发财致富。这些买办商人产生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中国近代的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

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的同时，侵略势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五个通商口岸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侵略者的军舰经常出入停泊，外国流氓冒险家麇集，抢掠行凶事件随时发生。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外国人口贩子，猖狂地进行掠卖人口。五口开放后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国的流氓，在上海、厦门、汕头、南澳、广州、澳门各地，用欺骗、威胁甚至绑架等手段，劫掠中国劳动人民（即所谓“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非洲等处做苦工。外国侵略者为了大规模掠卖华工，在中国各地也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充当爪牙。英国领事阿礼国在报告中说：在广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这些人被绑匪带去，就成为囚徒，按人头定价被卖给“苦力”承包人，运出海面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掀起一种塌天大祸的感觉。”在上海，英国侵略者甚至直接掠捕进入“租界”出卖农产品的中国劳动人民。

被掠卖的中国劳动人民在出国的途中，乘坐的船被称为“浮动地狱”，船上备有全副武装。被掳掠来的中国劳动人民，全部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底舱里，因为遭到非人的折磨，中途死亡率甚至有高达百分之四十五的。被掠卖出国以后，大批被折磨致死，幸存的从事终身的强制劳动，做一世奴隶，永无脱身之日。

被掠卖的中国劳动人民，不甘屈服，勇敢地不断进行反抗。几乎没有一艘运载“苦力”的船只不发生暴动。如一八五二年，美船“罗伯脱毕朗”号从厦门载运了四百多名“苦力”去旧金山，途中“苦力”起来暴动，杀死船长，强迫该船驶返厦门。当这种暴动遭到资本主义强盗血腥镇压时，他们坚持抵抗，宁愿与船只一起沉到海底，也决不投降，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外国人口贩子掠卖人口的滔天罪行，完全是在外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下进行的。这就是艾奇逊之流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带来的为以往的侵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

上面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十年左右短短的时间内，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侵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所给予中国人民的严重灾祸，可以看出，鸦片战争究竟对中国起了怎样的恶劣影响。对于这样一次可耻的侵略战争，西方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却千方百计地为它掩盖粉饰，进行欺骗。刘少奇一类骗子同他们一唱一和，居然把这样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肮脏侵略战争，美化为给中国“注射了一针有力的翻魂剂”！在这里，刘少奇一类骗子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的奴才相，暴露得何等淋漓尽致！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英国强盗，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在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到处横行不法，欺压和奴役中国人民，这就不能不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人

民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日益加深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继续发生。而广州人民由于在战争中受害最深，因而反侵略斗争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自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结束后，广州城乡人民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就纷纷以“社学”形式，组织武装力量，来抵抗侵略者。

社学，原是乡村里的封建教育机构，后来慢慢形成为地主士绅兴办“团练”的处所。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进攻广州，特别是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广州一带具有新的斗争内容的社学，逐渐发展起来。

最早成立起来的，是广州西北乡三元里一带的升平社学，后改为升平公所。接着，广州城内及附近各乡的社学，也相继成立。在东路各县有东平社学，河南桥内有隆平社学，南门以外有南平社学，广州城内有城厢社学。升平社学在各县社学中首先组织反侵略武装，实力雄厚，成为各社学的领导中心。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店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组织的作用。群众零星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经过社学这一组织，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参加社学的义勇的人数最多时达十余万人。

声势浩大的社学，多次领导了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一八四二年底，英国水手行凶后逃入洋馆，数万群众围烧了洋馆。一八四四年，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河南一带人民群起反对，三千余人到洋馆抗议示威，迫使侵略者放

弃强租河南地区，暂时停止了在广州建立“租界”的活动。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抗英斗争感到不安，新任两广总督耆英污蔑社学群众为“游棍”“匪徒”，卖国官吏黄恩彤胡说什么“粤患不已，不在外而在内”，妄图伺机进行破坏。

反入城斗争是广州人民在社学成立后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斗争。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南京条约》并没有允许英国侵略者入城的规定，但侵略者有意曲解约文硬要进城。一八四六年一月，耆英在英国公使德庇时的威迫下，贴出告示，宣布允许英人进城。这就立即激起群众的愤怒，群众撕毁告示，张贴了许多揭帖，警告官员如果允许英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杀之”。数千群众随即拥入了广州知府刘浚的衙门，吓得刘浚狼狈越墙逃命，愤怒的群众烧毁他的官服、靴帽。社学还贴出告示，约期聚攻洋馆。于是德庇时躲到香港。清朝政府的“抑民顺夷”政策，受到了有力的打击。

一八四七年，英国侵略者想用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达到进入广州城的目的。四月间，德庇时率兵一千多人，突然乘军舰闯进虎门，强行驶入内河，再次向耆英提出入城要求，耆英瞒着人民与德庇时密约两年后进城。但人民没有放松戒备。到了一八四九年，继耆英后担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看到人民高涨的抗英情绪，不敢履行密约。英国香港总督文翰带兵船到虎门口外强迫清朝政府履行密约，广州人民坚决抵抗，城厢内外和河南地方居民组织十万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迎战，城郊各社学群众都枕戈待旦。广州商人也宣布与侵略者断绝交易。

在这种形势下，徐广缙不敢违抗群众的意志，拒绝了文翰的进城要求。文翰恼羞成怒，悍然率兵船闯入省河，各乡群众赶来准备战斗，省河两岸汇集群众十余万人，杀声震天，文翰恐惧，放弃了入城的要求，退回香港。后来，徐广缙奏报道光帝说：“阻之（指阻英人入城）未必遽开边衅，轻允之必至立启兵端”。清朝政府表面上曲承民意，实际上只是一时借以躲开就要延烧到自己头上的火焰而已。

广州入城问题是侵略者蓄意制造的。英国侵略者所以有意曲解条约坚持入城，就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中国必须答应。侵略者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却遇到了中国人民这个和清朝政府截然相反、决不屈服的强大对手。一八四九年文翰强欲进入广州城失败后，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供认：“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一八四一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侵略者慑于中国人民的力量，而暂时不敢再提入城要求。

在广东人民继续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同时，全国各地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发展，国内阶级矛盾迅速发展，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危急加剧。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就指出这一形势说：“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





2 037 8645 7

加上了新税捐。”<sup>①</sup>由于原有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又加上新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本已十分尖锐。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府为了支付总数共达七千万元的战费与“赔款”，到处搜括，吏治更加败坏，各级官吏重重剥削，额外摊派层出不穷；豪绅地主则勾结官府，力图把自己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广大人民遭受残暴的政治压迫与沉重的经济剥削，终于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仅仅根据《东华录》的记载，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九年，汉、回、苗、藏、彝、瑶、壮等族的起义事件，就有一百多次，几乎遍及全国。捻党、幅党、天地会等许多民间秘密组织积极活动。这一切预示着震撼中国大地的伟大革命风暴行将到来。

---

<sup>①</sup>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五页。